

包汉毅 著



文化视角下的 翻译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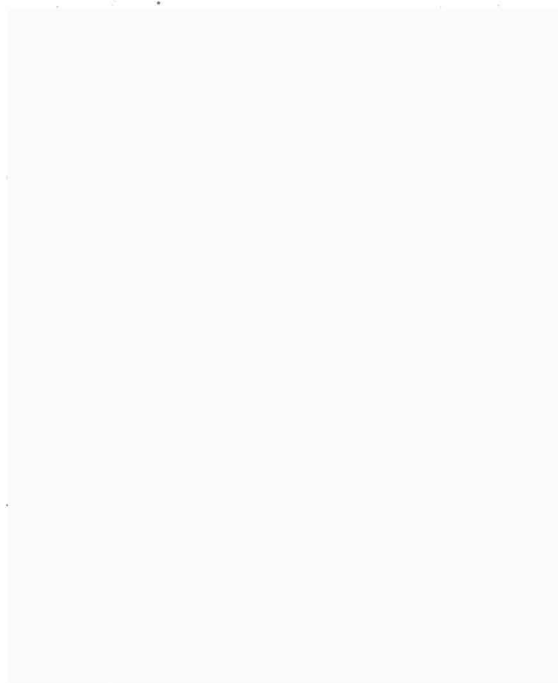
——以汉语熟语的德译为例

山东大学出版社

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以汉语熟语的德译为例

包汉毅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策略:以汉语熟语的德译为例/包汉毅
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607-4677-7

I. ①文…

II. ①包…

III. ①汉语—熟语—德语—翻译—研究

IV. ①H33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332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11.5 印张 288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年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定位于文化学导向的翻译学,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相关问题,选取了现代汉语文学中的熟语及其德语翻译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具体的要求,笔者分析认为 Johannes Heinrichs(1998)的文化概念可以担当翻译学以及本书的理论基础;然后在此定义基础之上,设计了海因里希斯方法,以此可以识别、析出熟语中的文化信息;其次进一步探清了文化信息的分类及其在文学源文中所承担的各种功能。

本书选取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及其两个德文译本(译者分别为 Ulrich Kantz(1993)和 Stefan Hase-Bergern(1992)作为研究素材。通过经验性分析,笔者归纳出熟语的通共 12 种翻译方法;接下来,对于每种方法,研究、论证了源语文化信息及其功能是否保留或者丢失。最后,在以上所述的分析基础上,笔者分别从归化和异化两个角度出发,提出、论证了各种情况下可能的熟语翻译解决方案。

总而言之,本书尝试从文化信息研析的角度,对文学翻译中熟语的理解和传递过程加以系统化,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翻译模式。

本书的研究成果既可应用于具体的翻译实践、教学,也对外语教学中熟语以及文化词的掌握、词典的编纂等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目 录

1 引言	(1)
1.1 一般性问题	(1)
1.2 研究对象、具体问题和研究目标	(3)
1.3 本书结构	(8)
2 担当翻译学基础的 Heinrichs(1998)文化概念	(11)
2.1 担当翻译学基础的文化概念所应当满足的要求	(11)
2.2 研究状况	(12)
2.3 Heinrichs(1998)的文化概念作为理论基础	(37)
3 翻译学理论基础	(46)
3.1 Koller(2004)的等价要求层级理论	(46)
3.2 文学翻译理论	(48)
3.3 目的论	(66)
3.4 两种根本不同的翻译类型	(68)
3.5 文学翻译应当遵循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原则	(70)

4	关于语料素材	(85)
4.1	关于作家陆文夫(1928~2005)	(85)
4.2	关于中篇小说《美食家》	(87)
4.3	《美食家》及其德译本作为语料素材的论证	(91)
5	“熟语”概念的定义	(93)
5.1	德语语言学中 <i>Phraseologismus</i> 的定义	(93)
5.2	汉语语言学中的“熟语”定义	(101)
6	熟语中文化信息的析出	(121)
6.1	研究状况	(121)
6.2	Heinrichs 方法	(138)
6.3	Heinrichs 方法应用举例	(149)
7	文化信息的翻译重要性分析	(165)
7.1	文信 1 的功能	(166)
7.2	文信 2 的功能	(182)
7.3	判断文信 2 同目的语文化的兼容性	(199)
8	文化信息及其功能在翻译时的保留或缺失	(203)
8.1	熟语翻译方法的研究状况	(203)
8.2	文化信息及其功能在各种翻译方法中的保留 或遗失	(215)
9	基于文化研析的熟语翻译批评	(245)
9.1	无形象鲜活性的熟语	(245)
9.2	有形象鲜活性的熟语	(249)

9.3 结论	(263)
10 文信 2 转为显性时的熟语翻译批评	(266)
10.1 转为显性的文信 2	(266)
10.2 文信 2 转为显性时的翻译批评	(278)
11 结论和展望	(288)
附件 1 语料句子	(291)
附件 2 表格	(323)
附件 3 缩写	(338)
参考文献	(339)
Inhaltsangabe	(360)

1 引言

本书定位于文化学导向的翻译学,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相关问题,探讨翻译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1.1 一般性问题

现代翻译学的奠基人 Eugene A. Nida(1945: 97)早就指出语言对于文化的依赖关系:“Languages are basically a part of culture, and words cannot be understood correctly apart from the local cultural phenomena for which they are symbols.”^①20 世纪 60 年代,翻译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其早期阶段,虽然翻译学烙有深深的语言学印记,但是 Nida 的语言总植根于一定文化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也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比如 Jakobson(1959), Nida(1964), Kade

^① 本书是翻译学领域的著述,其潜在读者群体一般而言会具备深厚的英语语言知识。因此,本书中的英语引言不再进行专门的汉译。

(1964), Catford(1965), Politzer(1966), Kade(1968), Nida/Taber(1969), Levý(1969)等等。然而,由于这一时期语言学导向的局限性,翻译学中的文化问题并未得到系统、彻底的探究。

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中发生了所谓的文化转折(cultural turn),这主要归功于德国翻译学家 Hans J. Vermeer 和 Katharina Reiß 的目的论。^①这一理论将翻译诠释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目的语文化的受众通过此交际而获得信息。^②德国翻译理论家 Stolze(2008: 197)认为此文化转折促使“Loslösung des Übersetzungskonzeptes aus dem rein linguistisch-textlichen Paradigma”(翻译研究脱离了单纯语言学、文本框架的束缚)。^③从此以后,翻译学的重心转移到了对翻译过程以及译者宏观环境(社会处境、交际情景和比如准则、习俗、价值观、传统等的社会文化框架)的探讨。依照 Kupsch-Losereit(2006: 206)的观点,这时翻译被描述为一种社会性和认知性行为,是源语文章(源文)作者、译者(同时作为源文读者和目的语文章作者)和译文读者三者之间的一种互动;翻译也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文本层面的技巧性行为,而是一种追循目的的活动,也受目的语文化和受众方的动态性制约;它要求以文化为导向,以促进理解;译者必须对源语和译入语两种文化都很了解,才能够贯彻这一文化导向,胜任文化中介者这一角色。

文化转折开辟了新的翻译学方向。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开始致力研讨文化和翻译之间的关系。比如 Kutz(1981), Newmark(1981), Neubert(1985), Reiß(1986), Vermeer(1986), Snell-Hornby(1986/1988), Newmark(1988/1991), Reiß/

① 参见 3.3 节。

② 参见 Vermeer(1989:55-56)。

③ 本书中的德语引言之后都附有由笔者所作的汉语译文。

Vermeer(1991), Gerzymisch-Arbogast/Mudersbach(1998), Hönig/Kußmaul(2003), Koller(2004)等等。

然而,这么多的研究翻译过程中文化难题的翻译学著述,对于如下两个问题,迄今也没有给出一致的、有说服力的答案:

(1)文化信息在源文中担当怎么样的功能?

(2)源文的文化信息在翻译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这两个问题即是本书所要研讨的一般性问题。

1.2 研究对象、具体问题和研究目标

为了研究翻译中的文化相关问题,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文化载体。一方面,这一载体应该有明确的定义,从而能够很容易地自文本中将其识别出来;另一方面它应当蕴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

熟语满足这两个条件。熟语是任何语言中都存在的常见现象,其界定有固定的标准。^①此外,对于同一个意义,不同的语言往往拥有不同的熟语来进行表达。比如汉语的“自搬石头自砸脚”(字义:“搬起石头来,想打别人,结果砸了自己的脚。”)和德语的 *Wer anderen eine Grube gräbt, fällt selbst hinein.* (字义:“为别人掘了一个坑,结果自己掉了进去。”)具有相同的实义^②——“想损害别人,结果却损害了自己”。这自然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另外,熟语中蕴含有大量的、为一种语言群体所特别传承的事物,比如人物、地点、动物、植物、物件、风俗、传说、历史、寓言、神话、宗教等等。^③也就是说,熟语体现着各个语言群体的独特性,因此是文

① 参见第5章。

② 作为一个整体,熟语所具备的意义一般不同于其字面意义,一般称为整体意义、实际意义或是基本意义,本书简称之为“实义”。参见第5章。

③ 参见 6.2.3 节。

化典型性的。王勤(2006: 134)认为:

熟语是重要的文化信息的载体,它记载和表达了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把它贮存起来世代传下去。由于熟语积淀了人类的文化,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形形色色,所以人们称熟语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汉语的熟语有六个子范畴,即是成语、惯用语、俗语、谚语、格言和歇后语^①;作为文化载体,它们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汉语熟语的数量极为庞大,蕴有各式各样的、丰富的文化传承^②,为文学作品所经常使用。比如,《中国成语大词典》(1998)、《中国俗语大词典》(1998)、《常用谚语词典》(1997)以及《俏皮话^③大全》(1992)分别包含大约 18000、15000、3200 和 26000 个词条;而作为本书语料素材来源的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在其仅 53773 个汉字的篇幅中就有 339 个熟语。^④

熟语存在于任何类型的文本。但是,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比如新闻、报告、专业书籍、哲学书籍、法律、合同等)的时候,通常是侧重于忠实传达源文的客观性信息;而在翻译呼唤型文本(比如评论性文章、宣传、论战、广告等)的时候,需要注重再现语言对于(他人)行为的激发性。(Reiß 1983: 10)

对于信息型文本中的熟语翻译,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 Werner Koller(1994: 364)表示:

In wissenschaftlichen Texten dürften phraseologische Ganzheiten

① 参见 5.2.3 节。

② 参见第 5~10 章。

③ 俏皮话是歇后语的另一名称,参见 5.2.3.5 节。

④ 熟语“落汤鸡”、“饕餮之徒”和“一窍不通”在文中分别出现了 2 次,成语“大街小巷”则有 3 次。

[...] häufig in erster Linie eine ‚ornamentale‘ Funktion haben; von ihrem phraseologischen Bedeutungspotential entfalten sie - anders als in literarischen Texten - nur wenig. [...] Sie können ohne weiteres nichtphraseologisch übersetzt werden, ohne dass der Text als wissenschaftlicher Text etwas verliert.

科技性文本中,熟语的使用经常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它们在其实义之外的延展——与文学性文本不同——甚少。……对于它们,可以不假思索地用非熟语化的语言来进行翻译,而不会造成此科技性文本的信息缺失。

由此可见,在翻译信息型文本中的熟语时,主要发挥作用的是其实义,它所包含的其他源语(文化)信息几乎可以无视。^①相反地,在翻译表达型文本(比如文学作品)时,源作自身的角色则重要得多(Schreiber 2006: 151)。Koller 和 Kohlmayer 都指出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作品的这种区别:

Im literarischen Text, im sprachlichen Kunstwerk, spielen die textinternen und -externen Bezüge, sprachlich-thematische Verflechtungen und Vernetzungen unterschiedlichster Art in der Regel eine ganz andere Rolle als in nichtliterarischen Texten. (Koller 1994: 67)

在作为语言艺术作品的文学文本中,文本内部的与对外的关联、各种不同形式的语言与内容的交织、连系都有着与在非文学作品中完全不同的角色。

[Eine Prämisse] ergibt sich daraus, dass es sich bei literarischen Texten um expressive Texte handelt. Das heißt, dass literarische Texte immer ein fingiertes sprechendes Ich bzw. menschliches

^① 参见 3.5.1.3 节。

Subjekt als Ausgangspunkt haben bzw. konstruieren, dass immer eine subjektive Perspektive präsent gehalten wird. Die ‚expressive Prägnanz‘ des literarischen Textes, sein subjektiver ‚Stil‘ [...] kann für die Zwecke des literarischen Übersetzers entsprechend den drei großen Gattungen konzeptionell etwa so vereinfacht werden: In dramatischen Texten geht es um ganze Figuren, es muss die verbale und körpersprachliche Sprech- und Verhaltensweise der einzelnen Figuren wiedergegeben werden; in narrativen Texten müssen die individuellen Stimmen des Erzählers und der zitierten Personen wiedergegeben werden; in lyrischen Texten muss die Stimmung bzw. - wie Herder sagt - der ‚Ton‘ erkannt und wiedergegeben werden. (Kohlmayer 1996: 191)

一个基本的前提源自于文学作品的表现性。意思是说,文学作品中总是从一个虚拟的、发言的“我”或者说是人性主体出发、建构,总是保持一个主体的视角。对于文学作品的译者来说,文学文本的这种“鲜明的表现性”、主体性“风格”[...]可以依照三种主要的类型进行如下的简化:剧本的翻译要再现人物的整体形象,包括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的方式、形态等;小说的翻译要保留作者个人以及人物角色语言的特色;诗歌的翻译则要再造源作的氛围、美学——如同赫尔德所说。

Elisabeth Markstein(2006a: 206)认为,与偏向于实用性的文本相比,文学性作品中的单词要具备一个大得多的语义密度,同时蕴有各式各样的联想和隐义。^① Koller(1994: 353)则将文学作品

^① 参见 3.2.3 节。

中熟语的翻译视为一个难以克服的任务：

Anhand der Analyse konkreter Übersetzungsfälle [...] wird u. a. gezeigt, dass Phraseologismen in literarischen Texten die Übersetzungsproblematik verschärfen, indem das phraseologische Bedeutungspotential im Bereich intralinguistischer, intra- und intertextueller Bedeutungen auf ganz andere Weise ausgeschöpft wird als in Sachtexten.

对具体翻译实例的分析……表明，文学文本中的熟语是翻译的特别难点所在，原因是：与在客观性文本中相比，其中的熟语意义在语言内部、语言之间以及文本之间都得到完全不同的极致发挥。

简言之，在翻译时，文学作品中的熟语不能“auf ihre rein denotative Bedeutungskomponente reduziert werden”（Koller 1994：366）（缩减到其单纯的实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现代汉语文学中的熟语译成德语为例，深入研究文化信息在翻译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极有价值的。

依照已述的一般性问题以及研究对象，现撰述本书的具体问题如下：

（1）哪一个文化定义可以担当翻译学文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2）基于此文化定义，可通过哪些步骤识别、析出熟语中蕴含的文化信息？

（3）在文学作品的源文中，熟语的文化信息起着怎样的、能够影响到翻译决策的功能？

（4）对于各类不同的翻译方法，源语熟语的文化信息及其功能是得以保存，还是遗失？

（5）在对熟语文化信息进行研析的基础上，可以最终确定哪种

(些)翻译方案是合适的?

对以上五个问题的解答是本书的研究目标。

一直以来,翻译学领域中的根本争端之一是翻译过程系统化与译者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对于此争端,可以说:只有进行系统化的努力,才能指明译者创造性的空间所在。^①

在对(文学作品中熟语的)文化信息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尝试从文化研析的视角对熟语的理解和传递过程进行系统化;换句话说,即是试图发现并描述不同主体都能理解、实践的科学性规则,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模式。

本书的研究成果既可应用于文化现象的具体翻译实践,也对外语教学中书语以及文化词的学习有着价值。

1.3 本书结构

引言之后的第2章首先阐述了翻译学文化问题研究对于文化定义的三要求,全部符合此三要求的概念可以担当本书的理论基础;接着对翻译学内部和外部的各类重要文化定义予以介绍和评析;最后详细阐释符合三要求、可作为翻译学以及本书研究基础的 Johannes Heinrichs(1998)的文化定义。

第3章的内容是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首先介绍 Werner Koller(2004)的等价要求层级理论以及 Kohlmayer(2008)、Markstein(2006a)、Reiß(1983)和 Nikula(2004)的文学翻译理论,接着阐述目的论以及文化接触视角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译法(传递性、异化译法和适应性、归化译法),然后提出并论证文学翻译中应当遵循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原则。它们是本书的翻译学基础。

中篇小说《美食家》以及译者分别为 Ulrich Kautz(1995)和

^① 参见 Floros(2003:3)。

Stefan Hase-Bergen(1992)的两篇德语译本是本书的语料素材,对于它们的阐释位于第4章,其中着重说明选择它们作为素材的原因。

德语的 *Phraseologismus* 与汉语的“熟语”相对应,它们是固定短语的科学性概念。在第5章里,分别从德语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的角度阐发了熟语的三个标准。汉语熟语所具有的六个子范畴。也在本章中一一得以详解。

第6章的探讨对象是析出汉语熟语中所蕴含文化信息的方法。在描述了此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之后,就详细阐释了由笔者自己依据 Heinrichs 文化概念而制定的 Heinrichs 方法,它用以析出(文学作品上下文中)熟语乃至其他类型语段中所蕴含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文化信息。本章最后以实例来说明 Heinrichs 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第7章分别分析了熟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文化信息在源文中所起到的、能够对翻译决策产生影响的功能(文学翻译重要性的功能分析)。

第8章首先撰述、评价了熟语翻译方法领域中的研究状况;然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美食家》的两篇德文译本中统共运用了哪一些翻译方案;最后判别了源语熟语的文化信息及其功能在运用每一种翻译方案时的保留与否。

在以上各章的分析基础上,第9章探究了如何从文化信息研析的视角恰当地翻译文学上下文中的熟语,同时对 Kautz 和 Hase-Bergen 的译文进行了评价。

第10章是关于熟语中的第二类文化信息由隐性状态转为显性状态的两种情况:熟语的修改和熟语的字义在上下文的衍伸。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进行合适的翻译、Kautz 和 Hase-Bergen 的翻译是否恰当也是本章所探讨的内容。

第11章总结了本书的研究结果。

如无特别说明,引文中的特殊格式系原作自身所有。

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各项为笔者自己所为:

- 德文引言的中文翻译
- 例句以及正文中的黑体、斜体、下画线等特殊格式
- 熟语的字义以及实义
- 修改熟语以及对熟语字义加以衍伸的语段的字义和转义